

中国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王星光 主编



中国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王星光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全书共收录了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分为“中华农耕文化”“农业科技史”“环境与农业历史”三部分,分别对中华农耕文化、中国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交流、中国农业耕作理论与技术、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中原农业历史成就、中国农村社会与风俗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系统地展示近年来中国农业历史与中华农耕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视野,推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社会意义。

本书适合从事历史、考古和科技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 王星光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03-044065-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农业史—中国—文集 IV. ①F3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960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9 1/2 插页: 1

字数: 850 000

定价: 2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金秋十月，是中原大地一年四季中最温润惬意的收获时节，而在2013年的10月26—28日，由郑州大学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在河南省会郑州隆重举行。地处中原的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国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中国古代八大古都的郑州、安阳、洛阳、开封都在河南境内。距今10 500—8600年的河南新密李家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将中原地区农业的起源推进到距今10 000年以前。距今8000—7000年的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与李家沟遗址相呼应，表明五岳之一的嵩山周围地区，是中国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瑞典地质与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浉池县仰韶村发现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在仰韶遗址陶片上发现的稻粒印痕，应是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稻谷遗物。1898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后，1928年开始在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与农业有关的遗存，胡厚宣先生在1938年发表的《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就对此作有深入的研究。在内黄三杨庄发现汉代农业聚落遗址，十几座农家庭院、大片清晰可见的农田被发现，再现了汉代村落、民居、农田及乡村生产生活的生动场景，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洛阳含嘉仓，历经隋、唐、北宋3个王朝，沿用500余年，唐天宝时的总储粮量达5 833 400石，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国家粮仓。明清以来，河南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的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1/10以上，确立了农业大省的地位。例如，以小麦生产为例，种植面积长期占全国的1/5，总产量占全国的1/4，单产比全国平均值高20%左右，每年向全国出售小麦商品粮达100多亿斤^①，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首。由此可见，地处中原的河南，不仅自古就长期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之所在，今天的河南农业在我国也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厚重的中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相辅相成，同为河南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举办一次高规格的农业历史学术会议，应是河南学界理应担当的责任，也无疑是对河南农史研究的有力促进。

河南的农史研究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荆三林教授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中国生产工具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195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一书，其中有大量的中国农业工具史的内容，应是包括中国农具史在内的中国生产工具史的开山之作。荆先生从1978年开始在郑州大学讲授中国生产工具史课程，1983年开始招收科技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就是当年荆先生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为了培养研究生，他还专门聘请时任《农业考古》杂志主编的陈文华先生为其讲授中国农业科技史及农业考古课程。我的硕士论文《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就是农业历史方面的选题，从此基本确定了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方向。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郑州大学从事中国科技史、中国农业史等的教学和研究。1987

^① 1斤=500克。

年9月，我陪同荆先生一起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荆先生当选为首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的顾问。1991年，郑州大学科技史研究中心成立。2005年，成为科技史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我开始在中国史学科招收科技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中国农史研究一直是郑州大学科技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生，农业历史都是其论文选题的主要内容，目前培养的科技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达60余人。经过近60年的长期积淀，以科技史研究中心为平台，郑州大学的科技史、农业史研究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团队力量。本次会议的筹备和承办，也是给予我们郑州大学科技史研究中心历练的机会和信任。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履鹏教授是一位长期从事农业历史研究的长者，也是河南农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在《农业学报》（1957年第1期）上发表《古代相传的作物区田栽培法》一文，他在深入研究《汜胜之书》和《齐民要术》的基础上，通过亲身的栽培试验，证实了古代区田法具有高产丰收的实际功用，受到农史界的高度重视。他还出版有《粟及其栽培技术》（农业出版社，1958年）、《粟的杂交育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1年），被誉为“中国谷子杂交育种第一人”。1979年2月27日至3月8日，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召集全国农史学界及有关学者在郑州举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首次编写会议，时任河南财经学院农经系主任的张履鹏先生就是会议的主要筹备人员之一。正是在这次郑州会议上，成立了以林山等同志为主任的编审委员会和以梁家勉先生为主编的编写委员会，制订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编写提纲。郑州会议的成功举办及《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后称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编写工程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农史学科春天的到来，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张履鹏先生的辛勤努力下，河南省农史研究会在1986年10月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省级农史学会之一，张先生被推举为河南省农史学会的会长。1987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张先生当选为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的副会长。为了推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工作的开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及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的支持下，我们于1989年5月在信阳举办了清代科学家吴其濬学术研讨会，并于1994年10月在开封召开了明代科学家朱橚学术研讨会。这两次重要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都与张先生的精心组织和谋划密不可分，在协助张先生从事这些活动中，我耳闻目睹了他所付出的辛劳。张履鹏先生出版多部著作，有《农业经济史研究》《历代农业经济文选注释》《中国农田制度变迁与展望》等，年过八旬的他笔耕不辍，仍在为农史研究的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荆三林教授、张履鹏教授等老一辈的学者为河南的农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传承学术文脉，弘扬优良传统，是我们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河南也与不少农史学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农史学家万国鼎先生1951年曾在河南省农林厅工作，1953年任河南农学院农学系教授，1954年被调往南京，负责组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现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缪启愉先生也在新中国成立初先后在河南省勘测公司和郑州市城市建设学校从事土地测绘和教育工作，1957年年初由万国鼎先生举荐，离开河南前往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开始专注于农史和农业古籍整理及研究工作。著名畜牧和农史学家张仲葛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曾多次来河南黄泛区农场等地进行种猪的改良和推广。2013年8月在郑州举办了张仲葛教授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著名农业考古、

农史和茶文化学家陈文华先生的农业考古研究也是于1979年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编写会议上受到了与会领导和学者的高度重视，由此他萌发了专门从事农业考古研究、创办《农业考古》杂志的设想，坚定了农业考古的研究方向。而他在1984年为国家文物局在郑州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农业考古”课程，标志着他创办的农业考古学科得到文物考古界的认可，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健康发展。不但农业考古的介入有力推动了我国农业历史的深入发展，《农业考古》杂志也为我国的农业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阵地和平台。回顾河南与这些著名农史学家们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深感温暖和亲切。樊志民教授在本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道“中原亦农史研究的重阵之一”，这虽属溢美之词，却也是对我们河南农史及科技史同仁的充分肯定和极大鼓舞。

本次会议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博物馆主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科技史研究中心承办，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协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农业博物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台湾中正大学、韩国釜山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是首次由综合大学举办的农史年会，其参会人员之众、论文提交数量之多，超过了往届，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学术年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得益于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及中国农业博物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得益于与会代表及提交论文的广大学者的热忱襄助。需要指出的是，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对此次会议给予了大力支持，历史学院党政领导安国楼、韩国河、荀书民、许俊平，办公室主任陈可猛及参与会务的师生给予了热情帮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海旺副院长为考察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提供了便利。本文集的出版也得到了郑州大学中国史学科振兴计划基金的有力支持。并且，本书的出版也是对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气候变化与秦汉至宋元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技术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0AZS005）的有力促进。我愿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里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本次郑州农史年会的部分论文的结集。与会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有80余篇，有些由作者自行发表，也有部分论文虽提出不少高论卓见，但限于篇幅，未予收录，尚祈见谅。收入本书的40多篇论文，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中国农耕文化、农业科技史、环境与农业历史等部分。由于文章的内容在收入本书的尚群昌博士生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综述》（载《中国农史》2013年第6期）一文中已有介绍，兹不赘述。对于收入本书的论文，我们除了进行编辑方面的技术处理外，本着尊重作者劳动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一概保持原貌。符奎博士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不少辛劳，科学出版社的孙莉编辑等也为本书的出版操劳颇多，张履鹏、黄世瑞、张宗子诸先生联袂为本书题赋书丹，我在此谨致谢忱。

王星光

2014年6月18日于郑州大学

目 录

中华农耕文化

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历史足迹及城乡二元结构伦理溯源·····	任继周 齐文涛 胥 刚 (3)
中华农耕文化技术起源沿革与应用·····	·····迟仁立 左淑珍 迟 彭 王亚东 梁晓东 肖胜远 牟丹琦 (23)
中国农村社会与民俗文化·····	·····黄世瑞邓 环 (37)
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社会结构所形成文学二元书写现象研究·····	·····郭树伟 (41)
“观渔”之礼的兴衰波动及其动因探研·····	·····段锐超 (46)
对晋陕蒙交界地带农牧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	·····卫 丽 (59)
韩半岛稻作文化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几点推测·····	·····苑 利 (69)
江西农业文化遗产概况·····	·····黄国勤 (81)
长三角地区染织文化的研究·····	·····李 斌 刘安定 李 强 (95)
农耕文明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云安 (105)
农耕文化与中国现代农业·····	·····乔 柏 (115)

农业科技史

自然生产力与农史研究(上篇)——如何认识自然生产力·····	·····李根蟠 (125)
简析我国史前之石农具·····	·····李三谋 刘德雄 冯如昌 (139)
先秦时期河南井灌与中原农耕文明发展·····	·····贾兵强 (151)
河南地区汉代的水利开发与农业区域·····	·····何金龙 (160)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汉代女性与农业经济发展·····	·····田艳霞 (167)
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农业开发及土地利用方式研究·····	·····刘馨秋 王思明 (171)
古代农书中出现的农民对播种期农作物的生态认识：以《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为中心 ·····	·····崔德卿 (180)
《齐民要术》中北方旱作农业的防旱保墒技术的探讨·····	·····郝福为 (202)
中国古代大豆加工与利用源流考述·····	·····杨 坚 宋 健 (207)
明清时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与粮食种植技术的进步——以江西为例·····	·····黄爱华 李丽娜 (216)
中国农业机械化转型期初探·····	·····曹振宇 周晓雷 (224)
现代农业科技在农村民俗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以多依村为例·····	·····刘彦琴 郑庭义 王宇丰 (229)

环境与农业历史

环境视野下的大禹治水与农业发展略论·····	王星光 (239)
全球视野下的粟黍起源及传播探索·····	何红中 (249)
略论嵩山地区原始农业发展的三阶段及其特征·····	黄富成 (260)
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宁地区的农耕文明·····	徐日辉 (275)
先秦至西汉田制的演变与生态环境变迁·····	张 强 (282)
西汉名田制执行中的卖爵与赐爵·····	张履鹏 (295)
尼雅遗址农业考古揭秘——精绝国农业考古资料搜括记述·····	卫 斯 (308)
三杨庄遗址所反映的汉代聚落形态·····	符 奎 (336)
安丰塘历史上水利生态问题与社会应对·····	关传友 (351)
中国石榴栽培历史考述·····	夏如兵 徐暄淇 (362)
中国苹果栽培历史论略·····	沈广斌 丁燕燕 (374)
南瓜传入中国时间考·····	李昕升 王思明 (384)
明清时期气候变化与太湖地区双季稻发展·····	陈 超 (393)
明末清初农业生产方式对索伦部三族形成的影响·····	衣保中 黄彦震 (405)
清初的具结制度与濒海之民的生计模式——以香山县为中心讨论·····	陈志国 (413)
清代前期中原地区与江南的粮食贸易——以淮安关为中心·····	杨建庭 (428)
晚清《湘报》中的茶业资料及其价值·····	周彦乔 (442)
民国江西农村现代化改良的总体效果——1936年江西农村社会·····	万振凡 (451)
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 综述·····	尚群昌 (458)

中华农耕文化

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历史足迹及城乡二元结构伦理溯源

任继周 齐文涛 胥 刚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20)

中华农耕文明守护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其体系之周密、理论之精深、历史渊源之久远、影响幅员之广大,为世界所仅见。众多小而分散的农户所建成的体量庞大的中华大帝国,其精神支柱就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伦理系统。这个精微而深邃的中华农耕文明伦理系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孕育而底于成。华夏先民在农耕活动中,体验出人与自然的和合有序。《周易·乾文言》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①本文试图沿着这个天地和合之序,探索其历史足迹。传统中华农耕文明毕竟属于前工业革命时代,尽管其精华部分仍然闪耀时代的光辉,有些过时的部分已经被人遗忘,但仍然有一些滞留下来成为时代的赘瘤。吸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展为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型伦理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城乡的分异随处可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却是我国社会结构所特有的。其特色为土地与农民相羁属,农民户籍固定,子孙世代承袭,无特殊原因,不得转为城市居民。因而与城市居民相对的,农民成为特殊群体,城乡之间的鸿沟逐步形成。这在中国农耕文明中有其特殊农业生产和伦理学含义。我们在讨论中华农耕文明伦理的发展时,不能不对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涉及。

一、中华农耕文明伦理思想的肇始期(公元前1250—前771年)

从公元前13世纪殷商武丁定都安阳到西周末年,可视为中华农耕文明伦理系统的肇始期。就其伦理观特色来看,可称为“礼乐时期”。任何人群聚落都有其自发的伦理系统。商代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年)人们从游牧逐步转为农耕和定居,都邑与乡野始现分异。至周代邦国之规模初现而封建伦理系统肇始。这一时期法律极不完善,以社会习俗沿袭相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特定的农业生产自然环境下,逐步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图谱,这就是长幼有序、亲疏有别的家族式的伦理关系。“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②这个社会的轴心是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社会的伦理结构就是个人家族地位的扩大和演绎。这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等次关联,这种等次关联的形态就是“礼”。这就是农耕社会的初始伦理系统。

① 《周易·乾文言》,《四书五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75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礼,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观的时代称谓,可与“道德传统”同义,即后来广为流传而神圣不可侵犯的“道统”。礼维系道统的尊严,辅以粗糙的强制性刑罚,维持了邦国秩序的正常运行。这时的“刑”,尽管有时极为残酷,颇具震慑之效,但还不具备“法”的体系。因而,伦理观蕴涵的“礼”居主导地位。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还说:“不敬无礼,无礼不立。”^②甚至说到极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③孔子显然把与道德并列的礼系统置于“刑”系统之上。他认为,礼关乎社会结构的立废和人类文明的兴衰。此时“刑”只是对僭越于礼,即有悖于伦理的行为处以刑罚,以维护伦理系统的尊严,刑是礼的辅弼。同时,孔子提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④,这是“庶人”与“大夫”的伦理学分野,亦即乡村与都邑的伦理学分野。礼是“大夫”以上等级的人的行为准则,而乡村平民则归刑罚范畴。社会上层伦理表述的“礼”甚至承载了宇宙观,“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⑤,认为依靠礼可以经天纬地、安邦定国。无疑,礼是当时农耕社会伦理系统的最终表述。所以,司马迁说“礼者,人道之极也”^⑥,也就是说,礼是伦理系统的最高境界。我们不应忘记,封建社会的礼,是贵族之间的关系准则;维系国家政权,也只需要取得贵族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庶民无关。

礼需乐来彰显其形态,歌颂其权威,遂礼乐并称。关于乐,学者诠释得极其繁复,不胜穷究,其丰富的内涵自不待言。但从礼乐并称的逻辑看,“乐章德,礼报情”^⑦,或可表述礼乐并称的意涵。古代之乐,当以彰显伦理系统为主旨。《礼记·乐记》多有申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⑧,即乐为内涵,礼为外烁,礼乐同体,则道统彰显。“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⑨,在农耕文明中“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⑩。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乐为必要手段之一。甚至认为乐可上达天听,以协调阴阳,使风调雨顺、物种繁衍,有益于社会畅达繁荣。《国语·周语下》有:“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⑪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⑫乐应与天,这里赋予乐以更多的伦理承载,除了人际关系之外,还有天地人关系的协调。

① 《论语·为政》,《四书五经》,第7页。

② 《孔子集语·劝学》引《尚书大传略》。

③ 《论语·颜渊》,《四书五经》,第27页。

④ 《礼记·曲礼上》,《四书五经》,第297页。

⑤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四书五经》,第857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礼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3页。

⑦ 《礼记·乐记》,《四书五经》,第384页。

⑧ 《礼记·乐记》,《四书五经》,第382页。

⑨ 《礼记·乐记》,《四书五经》,第382页。

⑩ 《礼记·乐记》,《四书五经》,第386页。

⑪ 《国语·周语下》,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61页。

⑫ 《礼记·乐记》,《四书五经》,第383页。

乐虽有诸多性能,但有一个核心思想不可忽视,即“乐者,审一以定和”^①。《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②。乐需要“审一以定”,不得僭越失位,即乐的和谐,必须经过审慎地选定“一”的音来“定调”,才能“八音和谐”、各得其所。这个“一”的含义是什么?笔者以为就是适合当代的伦理准则,这是礼乐的根基所在。礼乐并立,但其根底还是伦理系统的礼。乐因礼而立。礼作为主体,乐作为辅弼,则礼得以充实而彰显。用今天的话说,把礼作为总路线,乐则是实践总路线的方法论。

我们通常说周朝衰微的时代是“礼崩乐坏”。这不是社会分崩离析的意向描述,说的就是周朝社会结构崩塌的实实在在的情状。周朝的封建大厦确实是以“礼乐”为支撑的。《周礼》和《礼记》是这一时期社会伦理系统的基本轮廓的描述。《周礼·月令》集中反映了伦理系统与所处农业自然地境的伦理学认知。发生于同时代的《夏小正》则将天文历法和自然物候杂糅成篇,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大成。《诗经》全景式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伦理系统的风貌,故以“诗经时代”概括这一礼乐的时代历史背景。

其时土地管理系统既管土地,也管土地上的居民,居民羁属于土地。其层级结构多达十三层,颇为繁复^③。廛里居核心地位,为贵族统治者居所,由近及远,逐级扩大,覆盖邦国全境。城乡二元结构于此胚胎初现。

二、中华农耕文明伦理思想的爆发期(公元前770—前221年)

中华农业伦理系统的爆发时期,历时约三个世纪,统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牛耕和铁器的使用,社会生产力达到新水平,以土地私有制为特色的私有制不断扩大。随着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社会动荡,礼乐伦理系统崩溃,各个诸侯国纷纷变法图强,谋求建立社会新秩序,并为此新秩序寻觅新的伦理依据,于是进入百家争鸣时期。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在社会伦理系统解体的时候,各个思想家对此提供诸多答案,这是众多思想家在“摸着石头过河”,不同伦理观点纷然杂陈,从而孕育了人类智慧的丰富矿藏,至今为我们享用不尽。纵观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唯一一次中华文明思想的大爆发。在这群星灿烂的争鸣时代,我们以管子、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简明扼要地阐述。

(一) 管子的伦理思想

在群星灿烂的众多思想家之中,管仲(公元前725—前645年)以其卓越的伦理思想和成功的社会实践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处于攻伐兼并的高潮,管仲的耕战论应时而出。“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④

① 《礼记·乐记》,《四书五经》,第387页。

② 《尚书·舜典》,《四书五经》,第219页。

③ 西周土地管理有十三个类级之多:廛里、场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公邑之田、家邑之田、小都、大都。参见《周礼注疏》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6页。

④ 《管子·治国》,姚晓娟、汪银峰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

此论一出，风靡天下^①。管仲提出更完整的伦理系统作为耕战思想的纲领。《管子》的首篇《牧民》可视为管子伦理思想的总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②这一段表述了管子的伦理思想的基本格局。不妨将其伦理要旨做如下概括：其一，务在四时。遵循季节时序，不误农时，充实仓廩，是农耕伦理系统的基础。粮足则国富，国富则衣食足，衣食足而后荣辱知，礼仪行。良好的伦理系统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其二，振兴经济。为了巩固邦国的经济基础，振兴农业，必须“禁文巧”，即抑制工商，他认为工商是社会弊端的总阀门，必须关闭。其三，树立人才。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③人才是实施伦理系统的必要条件。其四，建立政权。社会秩序必须有完整的政权框架给以支持。“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④有了教化手段，也建立了社会秩序，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治世。其五，普施教化。教化兴则社会秩序良好，少刑罚。对社会基层大众的伦理观普及版是“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敬畏鬼神，尊崇自然，恭敬祖宗，容易被大众理解。而对社会上层的高级版则是“四维”，这是管子社会伦理的最高纲领。他把前代封建社会的荣辱礼仪等思想作为原胚，抽象衍发为礼义廉耻，称为国家的“四维”。四维涉及人际及国际关系准则。他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⑤“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⑥四维是治天下行为的总谱。

务四时、振经济、树人才、兴教化、倡四维，可以作为管子伦理系统的总括。《管子》全书，实为战国时代的社会学教科书，它对于修身、居家、农耕、物候、土地、治军、治国无不涉及而且给以颇为丰富的伦理学阐述。从他的论述可以发现，其传承了周代“礼乐”伦理的思想，并为战国早期法家的萌芽奠定了基础。其伦理系统的普及版与高级版的区分，则是周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城乡二元结构伦理观的发展。尤其是四维理论，为后来儒家继承发展，构成中华社会中上层伦理的核心。在中国农耕伦理系统发展中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型特征。

① 《管子·治国》曰：“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简括说来就是：开垦土地—种植谷物—积存粮食—富国强兵—发动战争—开疆拓土。这时天下诸侯积粮成风。“秦地半天下”“积粟如丘山”，楚国“粟支十年”，齐国“粟如丘山”，燕、赵二国也是“粟支数年”。甚至韩国的宜阳县，也“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大势所趋，诚如管子所概括，“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参见任继周：《论华夏农耕文化发展过程及其重农思想的演替》，《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② 《管子·牧民》，第9页。

③ 《管子·权修》，第29页。

④ 《管子·权修》，第23页。

⑤ 《管子·牧民》，第10页。

⑥ 《管子·牧民》，第9页。

（二）孔子的伦理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管子以后，对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作出杰出贡献的思想家。假如说从管子的伦理观中可以看到周代的影子，则孔子的伦理观是反射周代伦理系统的镜子。孔子中年以前周游列国、游学问俗，并且短期从政，积累了对春秋时代的社会认知。他毕生憧憬周代的礼乐盛世，反复追索，企图恢复周代理想的礼乐世界而不可得。孔子面临沂水有感而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颖悟如此的孔子，对周朝已随历史长河流逝而去不得复返竟不曾察觉，真是历史之谜。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他看到鲁国大夫季氏用了天子用的“八佾”^①时，慨叹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中年以后，他充分利用了鲁国丰富的周代文物典藏，沉潜治学，讲学传道。孔子探索复古道路而不得，却出乎意料地从反面认知了社会，作出了许多深邃的伦理阐述，成为农耕伦理系统的瑰宝。管子是过渡者的足迹，而孔子则是过渡者的梦中人。孔子在梦境中建立了自己的伦理系统，其伦理系统的要点大体可概括为仁，为名，为命。

仁是孔子伦理观的总纲。他认为礼乐固然重要，而仁是礼乐的前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②他认为，礼是社会秩序的支柱，绝不可动摇。春秋时代弑君杀父、兄弟相残、以强凌弱，杀伐遍国中，孔子面对此乱局，束手无策。管子适应时代的进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突出贡献，“然孔子小之”^③。他鄙视管仲扶持齐桓公称霸诸侯而不去匡正周朝天下。显然，孔子落在他的前辈管仲后边了。孔子提出以仁为纲的伦理思想来救治时弊。他虽复古之愿未成，但所获的仁的普世价值观不容忽视。仁是什么？“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④颜渊追问，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⑤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⑥孔子对“五者”的解释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⑦礼是伦理系统的规范，而仁就是贯彻礼的修持范畴，因而可以说仁礼同源，只是表述方式有差异。从自我修养来看，他认为礼就是仁的行为物化。从社会意义来看，仁的含义则广泛得多。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这是以自己亲身体会来理解别人。但这还不够，还要主动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⑨，应该就近随时随地以行动帮助别人，来贯彻仁的思想。而仁的最高原则是不惜牺牲性命以成仁，“志士仁人，君子无求生

① 周礼，天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

② 《论语·八佾》，《四书五经》，第9页。

③ 《史记·管晏列传》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参见司马迁：《史记》，第393页。

④ 《论语·颜渊》，《四书五经》，第27页。

⑤ 《论语·颜渊》，《四书五经》，第27页。

⑥ 《论语·阳货》，《四书五经》，第38页。

⑦ 《论语·阳货》，《四书五经》，第38页。

⑧ 《论语·颜渊》，《四书五经》，第27页。

⑨ 《论语·雍也》，《四书五经》，第16页。

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①。因此，作为一个仁者，“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②，才能达到做人的完美境界。至此，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③，以践行至高理想的仁，达到人生的满足。孔子的仁的伦理观，从自身的修持，到人际关系的处理，再到家国历史的责任感，无所不在。按照冯友兰的说法，仁是“全德”（perfect virtue）^④。孔子伦理系统在仁的总纲下，衍发了多种伦理范畴，如“恕”，宽以待人；“义”，坚持真理；“中”，不偏不倚；“和”，平等接物；等等。

“名”是孔子伦理系统的载体。他认为“正名”是实现仁的首要任务。子路问孔子，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⑤孔子的正名，不是通常所说的名实相符，而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⑥。社会应有的伦理座次不容撼动。好像自然科学中的类型学，每一种生物、每一个类型，都有它固定的位置，否则就天下大乱。后世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由此而生。看似平平中性的一个“名”字，却是承载中华农耕文明的列车，奔驰数千年。

“命”是孔子的又一伦理准则。孔子认为命由天授，称为“天命”。孔子的“天命”观是仁的逻辑拓展。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仁是与天地相通的。当孔子的社会抱负不得实现或生活中遇到困厄时，尤其在晚年，一再提起“命”或“天命”。在匡国遇围困，生命危殆，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⑦在宋国遭桓魋追杀，孔子化装逃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⑧孔子对天命敬畏有加。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⑨“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⑩说到他自身的体验，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耳顺，六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⑪。到六十岁才知天命，可见他认为“知天命”是很高的思想境界。直到晚年，他所梦寐以求的礼乐盛世都未能复现，他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⑫他陷于悲观。但天命观赋予他宗教家的情怀，不计成败，“知其不可而为之”^⑬，“求仁而得仁，又何怨”^⑭。他对自己的人生充分肯定，“朝闻道，夕死可矣”^⑮。孔子怀抱仁的至境，回到天命的主题，成全了孔子卓越的抱有乐观情怀的悲剧人生。

孔子后人及其门徒对儒学有所发展，其佼佼者如孟子，主张人之性善，倡“义”以阐发其本

① 《论语·卫灵公》，《四书五经》，第34页。

② 《论语·子罕》，《四书五经》，第22页。

③ 《论语·里仁》，《四书五经》，第11页。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4页。

⑤ 《论语·子路》，《四书五经》，第29页。

⑥ 《论语·颜渊》，《四书五经》，第27页。

⑦ 《论语·子罕》，《四书五经》，第21页。

⑧ 《论语·述而》，《四书五经》，第18页。

⑨ 《论语·季氏》，《四书五经》，第36页。

⑩ 《论语·尧曰》，《四书五经》，第44页。

⑪ 《论语·为政》，《四书五经》，第7页。

⑫ 《论语·述而》，《四书五经》，第17页。

⑬ 《论语·宪问》，《四书五经》，第33页。

⑭ 《论语·述而》，《四书五经》，第17页。

⑮ 《论语·里仁》，《四书五经》，第11页。

性。荀子主张性恶，倡“学”以益其后天。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①，与孔子天人相应的天命论大异其趣，也从另一侧面丰富了天命观。这种“天行有常”的伦理认知是孔门学派的一大进展。孟、荀二子对后来儒学都有深远影响。

从社会学意义来看，儒家的伦理学说，今天仍不乏可取之处。例如，“为仁”作为一定的社会构架中的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正名”对实质的判断和类型的认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意义；作为自然规律的“天命”认知，尤其发展到荀子的“天命有常”的唯物论认知有众多的实践指导意义；至于为真理而献身精神等，更是普世追求的伦理高峰。

但我们应该明确，儒家的伦理学植根在管子伦理的高级版，即针对“大夫”以上的“四维”思想的发展，为统治阶层巩固耕地农业和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理论体系。对于庶民，孔子称为“小人”则很少涉及。

（三）老子的伦理思想

老子（生卒年不详，约公元前580—前500年）与孔子同时而略早。出于千湖之国的楚人文化渊源，老子对水有特殊情怀，进而对大自然的水性之领悟与社会史实交相参悟，产生出自己独特的伦理学概念。以其楚人文风，撰写五千言经典韵文，寓意深邃而悠远，令人回味无穷，是百家争鸣中独具一格的思想家。任继愈认为：“老子亲眼看到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看到仁的口号的虚伪性。”^②他慨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③老子凝练出自己的伦理观，要言之，曰“柔”，曰“下”，曰“简”，曰“无”，曰“道”。

老子贵柔。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④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⑤他从水性悟出道性，不但无坚不摧，而且施德不望报。水几乎就是道的化身。他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⑥大道荡荡淹流古今，人是不能左右的。

老子乐下。老子伦理系统对“下”的认知，来自水性就下而予以哲学参悟。他认为“居下为王”，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⑦下是水德的具象化。由“下”进而衍发为“退”。他看到当代伎求之心横流，提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⑧老子贵谦退以求安，“外其身而身存”^⑨，“夫唯不争，故无尤”^⑩。

① （战国）荀况：《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5页。

② 任继愈：《老子绎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③ 《老子》第5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页。

④ 《老子》第78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195页。

⑤ 《老子》第8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22页。

⑥ 《老子》第34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89页。

⑦ 《老子》第66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175页。

⑧ 《老子》第9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23页。

⑨ 《老子》第7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21页。

⑩ 《老子》第8章，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22页。